

·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
Serie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 思想文化论争

Debating and Discussing: Tagore in China

艾丹 著



人民出版社

·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
Serie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顾问 季羨林 主编 王树英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 思想文化论争

Debating and Discussing: Tagore in China

艾丹 著

责任编辑:武丛伟
装帧设计:语丝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艾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01-009152-5

I. ①泰… II. ①艾… III. ①泰戈尔,R. (1861~1941)-人物研究
②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33.515.6 ②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892 号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TAIGE ER YU WUSI SHIJI DE SIXIANG WENHUA LUNZHENG

艾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09152-5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总 序

王树英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印两国人民彼此往来,相互学习,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不仅曾为人类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中印各自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若中印两国之间没有互相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关系如此密切,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今天,我认为中印两国要继续发展,在学习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两国之间相互学习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们两国的国情大体相同:过去都有过不幸的共同遭遇,都受到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今天,两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两国都有丰富的资源和勤劳的人民;我们面临的任务也是相同的:都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再加上又是近邻。因此,我们两国之间相互学习和彼此交流则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中国正在奋发和平崛起,影响日益扩大,印度也在迅速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过去,中印两大文化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历史上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如何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世界文化不断繁荣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中印两国人民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是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新世纪已经开始,亚洲各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由于经济与文化密切

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有文化的更加繁荣,从而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文化的进步。而中印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泱泱大国势必在其中将充当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一发展趋势,已越来越成为更多世人的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中印两国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就显得更加重要。

令人高兴的是,中印两国的关系在不断改善,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官方互访,还是民间往来,都在日益增多,两国合作的领域也在逐渐扩大,这些可喜的事情,很令人鼓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渴望更多地了解印度;同样,越来越多的印度朋友也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种了解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等重要内容。

愿本套丛书对不断增进中印彼此了解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所裨益。不妥之处,尚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序

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文化和东方文化所知甚少。自然,对泰戈尔的学术和思想亦缺乏基本的了解。

当谈起不同文化的差异,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泛概念,且不说如何给文化定义,在尚不确定的东西方之下各自包含多少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又有谁能真正说清楚二者的差异呢?再者,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人们对东方文化的认知似乎更为模糊、更不完整。我注意到已故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在谈论东方文学时就曾触及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现在使用的‘东方’这个名称,常常是在单纯的地理概念中加入了政治的内容,即指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被压迫民族”。而“列宁多次使用的‘东方民族’的概念,也是指被压迫的民族而言。解放以来,我们常常把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都称为东方”(《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东方文学简史〉代序》,《季羨林序跋集》,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而“在东方文学范围内,中国文学自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中国,讲东方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指的只是中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学”(《简明东方文学史》序言,同上书,第112页)。由此看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形成真正文化意义的东方概念。这种基本认知的缺失,外加西方中心主义作祟,也就更使我们难以认清东方文化的真实面目。自然,对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关系

2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的认识便是模糊的。

本书作者艾丹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可能是我从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和跨文化理论研究影响到她,使她萌发出研究泰戈尔的想法。在她看来,对泰戈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陌生的印度文化乃至东方文化。

考虑到学科与学术背景,我建议她研究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并希望通过这一个案解析,进而引申到在东方文化内部的两大文化的比较。

当然这里也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选择研究的切入点?我们注意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的大变动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很多国外的学术大家纷纷来到中国“传道”。像杜威、罗素,也包括泰翁。不过他们几位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却是迥然不同的,后世的中国学人对他们的关注程度亦不大相同。泰翁无疑遭受到的都是冷遇。正是这一点,成为我们对泰戈尔研究的切入点。论文题目确定为:“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艾丹所受的本科与硕士教育都是在辽宁师范大学完成的,且所修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她这样的学术训练背景,要完成本课题研究,其间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艾丹的刻苦勤奋精神实在可敬,她以勤补拙,凭着对学术的执著,终于学有所得。她的论文答辩赢得了张西平、朱成甲、朱汉国、朱志敏、孙秀民等导师的高度评价。

那么这篇论文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梳理了泰戈尔在20世纪20年代几度访华的过程。其二,着力分析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泰戈尔及其学术、思想的不同态度,解析其中的误读。其三,通过研究泰戈尔,认识到消除误解与隔阂,加强中印文化交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其四,努力发掘出泰戈尔与印度中国学的内在联系。其五,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泰戈尔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梁启超等文化精英的复杂关系。其六,深刻反思泰戈尔的文明观,论证他在中国遭受冷遇的基本原因。

听说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该论文,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15年前也是由该社出

版的。人民出版社在我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因此,也要向出版社、编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作者之托,谈了一些对研究的看法,权且为序。

侯且岸

2010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泰戈尔访华	28
第一节 “一战”引起中西文化格局的变动	28
一、“西方的没落”与东方文化热的兴起	29
二、科学主义的衰落与人本主义的勃兴	33
三、进化论的渐弱与互助论的兴起	36
四、东西文明的直接平等对话	39
第二节 “泰戈尔热”的兴起与渐歇	42
一、起步阶段(1913~1919)	42
二、繁荣阶段(1920~1924)	43
三、消寂阶段(1925~1949)	55
第三节 泰戈尔两次访华的经过	57
一、1924 年访华	57
二、1929 年访华	81
第四节 “跨越喜马拉雅的障碍”	85
一、文化交流的沟通与界域的拓展	85
二、交流机构的创建与交流频度的增强	90
三、印度中国学的开创与中国印度学的发展	99

第二章 围绕泰戈尔访华的思想文化论争	106
第一节 泰戈尔与东西文化论争	106
一、东西文化论争的进程及焦点转移	107
二、泰戈尔的演讲与东西文化论争议题的契合	110
三、围绕泰戈尔的争论	115
四、历史评价	124
第二节 泰戈尔与科玄论争	126
一、科玄论争的缘起及进展	126
二、泰戈尔的演讲与科玄论争议题的契合	130
三、围绕泰戈尔的争论	134
四、历史评价	139
第三节 泰戈尔与“传统和现代”之争	144
一、“传统和现代”之争的进程与议题	145
二、泰戈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	146
三、围绕泰戈尔的争论	148
四、历史评价	151
第三章 泰戈尔与五四诸贤	154
第一节 陈独秀与泰戈尔	154
一、激烈的批判	155
二、对批判的解析	160
三、误读中的驱逐	165
第二节 胡适与泰戈尔	171
一、有保留的欢迎	171
二、宽容与认同	176
三、历史评价	179
第三节 梁漱溟与泰戈尔	181
一、“若即若离”	182
二、文化理路的诸多差异	185
三、形异质同的文化观	189

第四节 梁启超与泰戈尔	193
一、不遗余力的欢迎	193
二、对东西文化体认的情意相通	196
三、梁启超对泰戈尔认知的缺陷	200
第四章 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	203
第一节 东西文化的调和	203
一、主张的分歧	204
二、调和的窘境	211
三、路向与路径	215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219
一、传统的定论	219
二、历史的真相	224
三、反思与价值	230
第三节 中印文化交流的顺通	236
一、文明的差异	237
二、文明的误读	243
三、障碍的清除	250
结 语	255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71

图 表

表 1	中国知网刊载有关泰戈尔的文章数量统计表(1990~2009)	5
表 2	《小说月报》发表译介与研究泰戈尔的文章情况	44
表 3	《晨报》和《申报》刊载泰戈尔访华实况的报道	46
表 4	1920~192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泰东图书馆出版泰戈尔 译著的情况	48
表 5	继《小说月报》后全国主要报刊出版“泰戈尔专号”的情况	49
表 6	1920~1924 年泰戈尔作品中译本数量统计表	51
表 7	1925~1949 年译介与研究泰戈尔的文章数量统计表	56
表 8	泰戈尔访华期间的行程表	61
表 9	江绍原在《晨报副镌》发表有关泰戈尔的文章统计表	79
表 10	梁启超陪同泰戈尔系列活动	195

绪 论

一、泰戈尔访华的思想文化意义

印度诗哲泰戈尔凭借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一生著作颇丰，在文学、哲学、教育、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享有“东方文艺复兴之父”的美誉。在“一战”引发各国学者重新审视东西文化的背景下，泰戈尔应中国学者之邀于1924年和1929年两度访问中国。泰戈尔的到来引起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关注，其在中国的举动特别是以复兴东方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演讲引发了五四思想界的激烈争论。

在泰戈尔访华前后，也有著名的西方学者访问中国，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但泰戈尔访华所掀起的波澜之大、引发的争议之多、牵涉的人物之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遗憾的是，泰戈尔访华仅为较少的学人所关注。在已有的泰戈尔访华研究中，学界多集中于阐述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安排，对其访华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甚少涉猎。因此，对泰戈尔访华事件的梳理，特别是对该事件产生影响的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都是值得关注的。

五四运动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起点，因而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当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围绕思潮、学派、论争和学人个案等不同侧面展开。泰戈尔访华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五四运动”的独特视角，即从五四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一个访华的外国人这一视角，透

视整个五四思想界的状况。这一视角之所以独特,主要在于这个外国人不是来自近代以来中国所仿效的西方国家,而是来自与中国在领土上接壤,拥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和相似历史命运的印度。

在泰戈尔访华引发的思想文化论争中,不论与泰戈尔观点貌似相同的梁漱溟,还是与泰戈尔相敬如宾的胡适,抑或是与泰戈尔惺惺相惜的梁启超,再或是明确表示与泰戈尔势不两立的陈独秀,他们或多或少都误解了泰戈尔的本意。造成误解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社会经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文化取向等个人方面的差异,还与在中印两国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有关。科学地分析泰戈尔被误读的原因,有助于消解中印文化交流的思维障碍,促进中印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正常交流。

泰戈尔访华引发的思想文化论争,对于我们认清“五四”后中国文化的走向,以及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深层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泰戈尔访华在五四思想界引发的激烈争论所揭示的根本问题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及文化渗透,如何实现东方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当今东西文化深入交流并走向融合的世界背景下,从泰戈尔访华这个文化个案深入思考如何实现东西文化的调和,怎样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这对于中国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泰戈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们把泰戈尔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的举动密切了其中国的关系,从此泰戈尔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近百年来,泰戈尔深深吸引中国读者视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学界开始了对“泰戈尔与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之后,在争取民族解放、摆脱封建压迫的紧锣密鼓的动荡年代,“泰戈尔与中国”的研究逐渐转入潜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资深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研究的进展。

(一)建国以后“泰戈尔与中国”研究的阶段划分及特点

1. 沉寂期(1949~1978)

1956年,周恩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讲话,赞扬了泰戈尔在世界文学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中国境内的新闻媒体立即报道了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重新燃起了中国学者对“泰戈尔与中国”研究的热情。

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系主任的季羨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撰写于1958年,刊登于《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一文,对泰戈尔有所论述,但谈及“泰戈尔与中国”的内容不多。1961年,泰戈尔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出版了10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同年,季羨林在《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文艺报》1961年第5期)一文中,简略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好与热爱之情。另外,梅兰芳在《忆泰戈尔》(《人民文学》1961年5月)一文回忆了泰戈尔访华时与泰戈尔接触的情景。

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集中于重新翻译和再版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的研究极少,这表明学界对泰戈尔研究的兴趣不大。

2. 恢复发展期(1979~1989)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经历“文革”灾难的中国百废待兴,学界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纪念泰戈尔诞辰120周年的大会,可视为“泰戈尔与中国”研究上具有正本清源意义的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泰戈尔生前热爱中国,并且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中国人民的挚友。应该扫除在泰戈尔评价问题上的‘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肯定泰戈尔1924年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评价泰戈尔及其作品。”^①此后,“泰戈尔与中国”研究重新踏上学术探讨的轨道。

这一时期,学者们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多,质量却很高。季羨林在《泰

① 《我国举行泰戈尔学术讨论会》,《国外文学》1981年第3期。

4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戈尔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一文中,从“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心”、“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的瞻望”四个方面,阐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张光璘撰写的《泰戈尔在中国》(《外国文学》1981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心和泰戈尔访华回国后创办中国学院等方面的情况。戈宝权撰写的《泰戈尔和中国》(《南亚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主要回顾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以来,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译介和流传的情况。这三篇文章从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在“泰戈尔与中国”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另外,黄心川撰写的两篇文章《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和《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南亚研究》1981年第2期),为“泰戈尔与中国”研究奠定了哲学和文学基础。

这一时期出版的泰戈尔传记和评传,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为研究泰戈尔思想的轨迹提供了参考资料。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对泰戈尔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泰戈尔访华的情况、泰戈尔作品的译介、泰戈尔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等方面都有涉猎。

3. 繁荣期(1990年至今)

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戈尔与中国”研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主要表现在:第一,泰戈尔作品的出版和翻译趋于全面和系统。据不完全统计,1990~2009年出版的泰戈尔译作达上百种,诗歌和小说的单行本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翻译集是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4卷本《泰戈尔全集》。该书由刘安武主编,是中国老中青三代优秀翻译人员集体创作的结果,为“泰戈尔与中国”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原始资料。第二,有关泰戈尔的传记性作品大量出现。这是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流行的“传记热”的影响。这些传记性作品对人们了解泰戈尔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活动大有裨益,但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雷同性,并对泰戈尔的思想缺少深入的解析。第三,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研究的资料、专著和论文等成果不

断涌现。张光璘主编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年)、沈益洪主编的《泰戈尔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和孙宜学主编的《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都属于史料汇编性的书籍,被引用的频率较高。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 2003 年版)、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和孙宜学的《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都是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其中前两者是作者在撰写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笔者从中国知网检索有关泰戈尔研究的相关数据(表 1)显示,1990~1999 年,学界对泰戈尔的研究并不广泛,但 2000 年以后,泰戈尔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其中,对泰戈尔文学思想的研究最多,对其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文化思想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同时,对“泰戈尔与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大大增强。各大高校的社会科学版学报和区域性的社会科学类杂志日益成为发表泰戈尔相关论文的主要阵地,例如:《南亚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大量质量上乘的文章。此外,2000 年以后,与“泰戈尔与中国”研究直接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数量也在增多,如:尹锡南的《泰戈尔的文明观及其在东西方的反响》(四川大学 2002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任文惠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误读——以东西文化观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娟的《泰戈尔与“五四”新诗》(曲阜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由于著者所学专业绝大多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印两国的文学比较方面,有关泰戈尔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比较薄弱。

表 1 中国知网刊载有关泰戈尔的文章数量统计表(1990~2009)

年份	有关泰戈尔的文章总数量	有关泰戈尔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的文章数量	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的文章数量
1990	13	8	6